

明代卷

朱易安 著

中国诗学史



陈伯海 蒋哲伦 主编

鹭江出版社

明代卷

朱易安 著

中国诗学史

鹭江出版社

陈伯海 蒋哲伦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学史. 明代卷/陈伯海, 蒋哲伦主编; 朱易安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2.9

ISBN 7—80671—138—4

I. 中... II. ①陈...②蒋...③朱... III. 诗歌史—中国—明代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9445 号

中国诗学史

明代卷

陈伯海 蒋哲伦 主编

朱易安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人民日报社福州印务中心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90×1240 1/32 8.25 印张 4 插页 187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1—138—4

1·36 定价: 16.5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长期课题研究成果之一。全书共分七卷，前六卷按历史朝代分编，起于先秦，迄于清末，每卷详述一个时期的诗学状况；另设《词学》一卷，综述词学的发展历程。本书以诗歌理论的演进为经，以诗歌的各类活动为纬，将诗学观念与接受主体、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阅读、批评、写作诸环节的展现相结合，建立起一种以诗歌的接受史为视角，用接受范式来整合多元材料的论述模式，进而架构起历史与逻辑相互结合的理论体系。

中国诗学史总目



中国诗学史导言（陈伯海）

总论：中国诗学观念的流变（陈伯海）

先秦两汉卷（翁其斌）

魏晋南北朝卷（归青、曹旭）

隋唐五代卷（倪进、赵立新、罗立刚、李承辉）

宋金元卷（黄宝华、文师华）

明代卷（朱易安）

清代卷（刘 诚）

词学卷（蒋哲伦、傅蓉蓉）

后记

中国诗学史

- 先秦两汉卷（含导言、总论）
 - 魏晋南北朝卷
 - 隋唐五代卷
 - 宋金元卷
 - 明代卷
 - 清代卷
 - 词学卷
-



第一章 概说

第一节 明代诗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 1

第二节 明代诗学的特征 / 8

第三节 明代诗学的嬗变 / 27

第二章 元、明之交的诗学

第一节 “诗必盛唐”的渊源 / 35

第二节 “师古”“摹拟”创作观的形成 / 41

第三节 “别体制审音律”的方法定位 / 45

第四节 扬“正”抑“变”的诗歌发展观 / 51

第三章 正统、成化时期的诗学

第一节 “声情统一”的心学启迪 / 56

第二节 李东阳与“格调说” / 61

第三节 “眼主格耳主声”与“倒学”的建立 / 66



第四节 吴中传统 / 71

第四章 弘治、正德时期的诗学

第一节 “复古求真” / 76

第二节 “倒学”理论实施的矛盾和狭隘趋势 / 82

第三节 李、何的“筏喻”之争 / 85

第四节 “宽裕之风”和“温润之气” / 90

第五章 格调论以外的诗学

第一节 “因情立格” / 97

第二节 道学家的诗论 / 103

第三节 宗唐别调 / 107

第四节 杨慎的考证诗学 / 112

第六章 嘉靖、隆庆时期的诗学

第一节 结社与明人选评明诗 / 121



- 第二节 《古今诗删》和格调说的危机 / 128
- 第三节 修正“格调说”的发端 / 133
- 第四节 王世贞的救弊和诗学观念的衍变 / 139

第七章 万历时期的诗学

- 第一节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学流派 / 148
- 第二节 《诗归》以及“师古”“师心”的调和 / 160
- 第三节 格调派诗学理论的改良 / 166
- 第四节 《诗数》与格调派诗学的终结 / 172

第八章 明末的诗学

- 第一节 《诗源辩体》和“大变”诗学观 / 181
- 第二节 《诗镜》和“情”“韵”理论 / 186
- 第三节 “言志”诗论的复兴 / 192

第九章 明代诗学文献



MULU

目录

第一节 明人诗集和总集的编纂 / 202

第二节 明人诗格诗话文献 / 207

第三节 明代诗学文献的文体形态 / 237

引用书目 / 247

附 记 / 257

第一章 概 说



1

第一章
概 说

元朝末年，蒙古族统治之下的元皇朝陷入空前的危机，各路群雄揭竿而起，天下大乱。其中朱元璋统领的队伍日渐强大，并力克群雄，于1367年北伐中原，次年攻下元大都，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元朝统治，重新建立了以汉民族为中心的统一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自公元1368年至1644年的明皇朝。

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明代的文化和文学发展，并不能与宋、元两代以及明以后的清代截然划分，它们应当属于同一的文化范畴——宋文化范畴。它们之间有许多共通的文化因素和密不可分的因承关系；许多文学现象常常互为因果，并非仅仅通过某一历史时段而能充分阐释，诗学的发展同样如此。但考虑到阅读的习惯，本卷仍然采用传统的历史划分方法，以有明一代的历史时限为界，着重勾勒明代诗学的状况，以便为读者提供比较广阔的文化背景和视野，并能让读者同时阅读本书的其他各卷，来加深对明代诗学的了解。

第一节 明代诗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由朱元璋建立的明代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明代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明太祖到“仁、宣之



治”的兴盛时期（1368—1435），又从正统的“土木之变”到万历初的中衰时期（1436—1582），最后发展至天启、崇祯年间（1583—1644），走向灭亡。正如李贽评价明代前期发展时所说的那样：“惟我圣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后几五十年，无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无一时而不思得贤之辅。……建文继之，纯用恩，而成祖二十有二年，则又恩威并著而不谬。仁宗继之，纯用仁，而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则又仁义并用而不失。”（《续藏书》卷一）明代政治的结构模式，以及明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各种潜在的矛盾因素，几乎都在明代的初期和“兴盛时期”，获得了确立。

明代政权，相对于元朝来说，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政权。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虽然采取了“汉化”的政策，特别是进关以后，大多数蒙古贵族被汉族同化，但元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主的，蒙古贵族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把本民族中一些落后的东西，带进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政策中去，因此，汉民族文化发展相对来说要缓慢一些。明朝统治者在确立政权后，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政策和体系的构建，有着十分浓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各种制度的建立，以史为鉴，重视参考元以前历代政权的做法，不仅注重政治体制上的高度集权，而且十分注重文化秩序的建立和完善，使中国又重新成为以汉民族经济文化为中心的统一的各民族国家。这种传统性格的培育，也是后来明亡以后，文人士大夫顽强抵制满族统治的内在因素。

从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传统的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人口和耕地大幅度地增长，水利建设受到重视，耕作技术有所改进，商品化农业生产空前发达。特别是手工业生产，不仅规模扩大，工艺流



程和技术获得改良，产量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规模化生产的效应。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拓展，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预示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即将开始。明代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经济状况，是社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

明代的社会政治制度是高度的中央集权，是中国宗法封建君主制向独裁方向发展的关键时期，这表现为绝对君权的确立。朱元璋对于利用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秩序来实行严格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有着深刻的认识。洪武九年（1376），在初步实现了安定统一的局面之后，废除了元代的行中书省旧制，在地方上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三司既相互独立，又互相牵制，以此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案发后，中央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朝廷政务改由六部分理，相应提高了六部的品秩，由皇帝直接控制。在废除丞相制的同时，又废除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改设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而无调兵之权。若逢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统帅，兵部下令，方可出兵。此外，洪武年间还颁布严格的户籍制度，颁行了《大明法》、《大诰》等一系列法典。为加强君权、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专制统治打下了基础。在这一系列政治体制建立和实施的过程中，胡（惟庸）、蓝（玉）之狱的大肆杀戮，以及成祖朱棣登基后对方孝孺等“诛灭十族”的残酷镇压等等，将明代的专制统治推向了顶峰。

出于同样的目的，明代君主希望从思想上也获得统一的天下一，所以重视建立文化秩序，重视设立学校和培养人才，为此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明代初期，程朱理学就被统治者奉为安邦治国的圣典，成



为官方的哲学。据记载，朱元璋在起义的过程中，就信用浙东儒生刘基、宋濂等。登基前一年，于宫室两庑书写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备观览。朱元璋还前往曲阜祭孔，表示要充分尊重孔子的学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在宋濂等人“论道经邦”，强调“礼乐之制”的影响下，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乡会考试的《四书》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依据，经义以程颐、朱熹及其弟子等注释为准绳。并规定，科举文章据于宋代经义、仿元代八比法，谓之“八股”，不许自由发挥，而且严格规定体例和字数，程朱理学由此成为官方的统治学说。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由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组织编纂三部《理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共二百六十卷，由明成祖亲自作序，颁布于世。《理学大全》几乎是程朱学派著作的汇辑，这种做法，表明统治者有意识地建立一套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系统完整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从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达到加强专制的目的。由于《理学大全》的推行与科举制度相结合，因此，很快被接纳，从朝廷国子学到地方书院、乡村的社学，无不盛行程朱理学的教育，造成“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①的局面。虽然明中期王阳明的心学异军突起，但程朱理学的思维方法和哲学传统仍然有相当的势力，程朱的学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有明一代三百年的学术方法和思想方法。

礼制和有关等级观念的制度化，也是明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工作。《明会典》中有关礼部的记述达七十五卷之多。据《明史·礼志序》记载，朱元璋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

^① 顾炎武《书传会选》，《日知录》卷一八。



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明史》卷四七）。朱元璋在位时，成书的已有《存心录》、《大明礼集》、《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国朝制作》等十余种。明代礼制的建立和完善，据学者考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洪武时期为初创阶段，发展至弘治年间基本完成；嘉靖时期再次更定，至万历年间完成。^① 有明一代不断地增加和完善礼制及乐制，把建立和恢复孔子所提倡的道德文化秩序，作为政治法律制度的辅助，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明代统治者深刻意识到软性的文化力量对于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性，其独裁化也深入地渗透到思想文化的统治中。中央集权的权威性和君权的神圣化，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体制中，同样也体现在思想道德文化传统中。而后一部分的建立和推行，则需要大量文人的参与，因此，明政权的种种举措，给明代文人和文化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明代办学的规模，要比前代庞大得多。学校有官学和私学之分。明代教育规模的扩大与入仕有密切的关联。当读书人接受启蒙教育以后还想继续学习，或通过科举求取一官半职，就必须进入官学。官学是指由政府出资并派员管理的，如太学、各类州府县学。《明史·选举制一》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明史》卷六九）明代初年，由于当时官吏缺乏，朱元璋早于登基的前三年（1365）在南京设立“国子学”，即后来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并把它作为招揽和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洪武中，朝廷对监生极为重视，大批监生直接擢为中高级官员，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明初官员缺乏的局面。

^①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九卷《明代》第25页，杜婉言、方志远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在太学读书的学生享受非常优厚的待遇：年龄在五十岁以下者，由政府供给衣食费用，家中可优免二丁差役等。^① 据统计，洪武、永乐两朝是国子监的鼎盛时期，在校人数常常在八九千人以上（黄佐《南雍志·储养考》）。明代中后期，监生地位有所下降，但通过“坐监”和科举入仕，仍是大多数读书人选择的道路。因此，明人常常从幼时的启蒙教育开始，便为日后进入官方学校做准备，应付官方统一安排的考试，成为读书人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生活。

教育的相对普及，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规范化，促使明人高度重视文化素养的培育。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明人文集来看，私人著述的比重很大。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显示的资料，台北“国家图书馆”所编辑的《明人文集联合目录》，收有明人别集近三千种版本。清人辑纂的《明诗综》、《明文海》，数量庞大。目前，《全明文》、《全明诗》正在编纂之中，所收作家作品数量更加庞大，可见明人文集之浩繁。明人文集所收著述以诗文为主，这一点可以说明明人的文学创作仍以传统的诗文为正统。

纵观明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明代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改革，有许多特点，而这些特点，不仅左右着有明一代三百年的历史趋势，同样也决定了明代文化及文学发展的命运。

明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政策，对于明代社会的价值观、社会风气的形成有十分直接的关联。例如，读书人一旦科举考试得中，便进入官僚的行列，于是获得相应的特权和关系网，而无权无势者即投其门下，逐渐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

^① 见《国子监》，《明会典》卷二二〇。



清人记载说：

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巡抚访拿，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它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孙之騄《二申野录》记载说：

明季缙绅，多收投靠，而世隶之邑几无王民矣。然主势一衰，跋扈而去，甚有反占主田产，坑主资财，转献新贵有势。……^①

上述材料中的后一则，虽是记述明代家奴事，但仍能说明趋炎附势的风气，已在全社会蔓延。此风延至文坛，便会表现为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形成的集团性和规模性。造成主流文学风尚之外的寂寞。《明史·文苑传序》说：“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明史》卷二八五）文中所谓“擅声馆阁”、“翕然宗之”的描绘，正是这种文学创作发展趋同特征的写照。

明代哲学思想的演变，也直接影响明代文学思潮的演变，

^① 《二申野录》卷二“四月条注”，转引自谢国桢《明季奴变考》。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